

“于道泉先生追思会”学者发言选登

编者案：在“于道泉先生追思会”上，任继愈、张公瑾、王钟翰、陈庆英、王邦维、白化文、应琳、喜饶尼玛、于陆琳、王尧等先生发言回顾了与于道泉先生的交往，对于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自由探索的精神、高风亮节的人格给予充分肯定。限于篇幅，现选登任继愈、张公瑾、王邦维三位先生的发言，以飨读者。

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馆长）：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

我和于道泉先生相识多年，他比我大十几岁，是我很尊敬的长辈和学者。我刚到图书馆工作时，有一次他晚上7、8点钟骑着自行车到我家去，说他有一些从英国带回来的藏学和宗教研究的书要捐给图书馆，这样具体的小事很多。我觉得今天开这个会纪念于先生很有意义，因为于先生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文古籍的奠基人，他打了个底子，才有现在这个规模；他给我们培养了一些人、一些后继者。于先生学风的谨严、谨慎、踏实，在今天浮躁的学风中是一剂很好的清凉药。现在学风浮躁，到处抢着出书，发表文章，甚至不择手段。照这个风气下去，整个学术界就会给毁掉。我们需要真干、实干，应该踏下心，下功夫做研究，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于先生甘于寂寞，克服了各种困难。他会多种语言，而且运用得很成熟。他在学问中不求名，不求利，一心一意树立好的学风，这个学风现在太稀少了，太可贵了，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样的学者多了，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国家图书馆是文化服务机构，从事文化服务的人也要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和文化修养，才能胜任这项工作。仅仅靠一般的服务，达不到国家对我们的要求。特别是藏学这一部分，在今天关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很重要的一门学科，这个学科有些后继乏人，再培养一位象于先生这样造诣很深的学者恐怕不是短时间的事，希望年轻学者能够接过于道泉先生的接力棒继续奋斗。现在有这样好的基础和环境，应该有更好的成绩做出来，特别是应该继承于先生的精神——治学的精神、刻苦的精神、不求名不求利埋头苦干的精神，把中国的文化搞上去。我们是大国，世界重视我们，但在文化建设方面，特别是人文科学——宗教、历史、社会、哲学，很多学科的研究还很薄弱。今天在座有这么多青年学者，我很高兴，愿你们沿着于先生的足迹走下去，把于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

张公瑾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培养自由探索的精神

于道泉先生离开我们快十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于道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并举办《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首发式，这最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于道泉先生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向举办这次会议的国家图书馆表示深切的感谢，向本书的编著者王尧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于先生的一生的确是平凡而伟大的，说他平凡，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端一碗汤菜，不找座位，站着就把这顿饭吃了。学校里经常有一些公务劳动，象拔草、打扫卫生之类，在这种场合，经常可以看到于先生的身影。其实，当时系里对他并不象对我们一般教员那样要求，但他总是严格律己，绝不要一点特殊化。他很重视劳动，好象在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贯彻到他的家庭生活中，从而传出许多他处理家庭事物的笑话。这些笑话，当时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好玩，其实他的背后却体现着一种崇高的精神。于先生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支配下生活的。他那么喜欢助人，经常给生活困难的青年人生活上的资助；他看到一本好书，总是多买好几本，以便可以赠送给青年人。他不分彼此亲疏，关心年轻人的工作。我不是学藏语的，五十年代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与于先生的办公室离得很近。有一次，他看到我在抄傣文句子的卡片，他问我做什么用，我说我正在编傣文语法讲义，抄卡片是来做语法分析的。他看了看我的卡片，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教我在他的一台打孔机上把卡片打出孔来，然后每一个孔指定一种语法现象、或者一个虚词，然后把孔边剪开。你要找这个材料的时候，只要用一个毛线针把相应的孔挑起来，这个虚词或这种语法现象的句子的卡片就完全落了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现在我们都有了电脑检索，可是在五十年代，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场技术革命，不知给了我多少方便。在后来的三十多年中，我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常常向于先生请教，于先生总是耐心帮助我。我不是学藏语的学生，他尚且如此关心指点我，可以想见，藏学班的学生们会得到于先生多么大的帮助。于先生没有流利的口才，著作也不多，但他一生孜孜不倦，老是思考着科学上最前沿的一些问题。当我们对计算机技术毫无了解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室里进行着实质性探讨了。他给我们做过报告，也写过文章，虽然后来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发展，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敢攀前沿的精神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灵魂和超自然现象的探索遭到了批判，

人们听说于先生相信有灵魂，觉得这是十分可笑的事，但很少人能够了解于先生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一位勤于思考，思想上不断探索的学者，有一些超乎常人的想法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于先生精神博大，内心世界异常丰富。他一生孜孜以求，学识渊博，要想完全了解于先生的精神境界是不容易的。他做学问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无拘无束，富有一种自由探索的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与现代观念的束缚，他已经把主体的内心世界与所研究的客观对象完全融为一体了。他自由跨越各种界限，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对超自然现象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他把传统的藏学研究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把藏研究和探索人生奥秘结合起来。他言传身教，不求后世留名。他精神贯注，不顾世俗得失。他重在感悟，因此述而不作。人们说他生活上象个孩子，其实，这正是李卓吾提倡的童心锁的境界。而在学说上，他上下求索，力图用现代科学来阐释内心的感悟。因此，他是一个充满着内部矛盾的统一体。而在外人看来，有时他就显得荒唐怪异，岂不知，这正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所在。中国学术思想源远流长，而且百花齐放，百家并立，学术思想的多样性是一件好事，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在近代学术史上，象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也是内心充满着复杂矛盾的人物。于道泉先生正是民族研究领域里这样的一位大师。在中国学术的谱系分类中，他应当是属于王国维、陈寅恪这个类型的。陈寅恪评价王国维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点在于先生的学术活动中同样是实现了。他的精神世界应该研究，他的精神财富应该尊重，他的思想精华应该发扬光大。王尧教授编著的《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于先生一生的完整形象，王尧教授是于先生建国之后最初的、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他对于先生一生和为人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一般人，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为传承于先生的精神，为我们了解这位一代宗师作出重要贡献。

王邦维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院长）：加强藏学研究的合作

我参加这个会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学术界为像于道泉先生这样著名的学者所做的纪念活动不是很多。我总是希望能从这些老一辈学者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包括他们的品格、人格、他们治学的道路和方法。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组织了一次非常好的会。今天开会的地方，环绕四周是一个手稿陈列，陈列最多的是近百年来学术界最伟大人物的手稿，这个气氛让我非常感动。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中国人的财富。我与于道泉先生只见过一面，于先生 1949-1952 年曾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工作过，当时东语系分三个小组，于道泉先生主持蒙藏满组。80 年代初期，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外国人的书评介绍引用于道泉先生的文章，这说明于先生几十年前的工作在 80 年代还得到世界其他国家学者们的重视。为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对于先生做过一次拜访，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学术上的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我特别觉得大学应当和图书馆很好合作，过去北大的向达先生、王重民先生都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于先生则对北图藏蒙满文文献的收藏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觉得我们应当多加强联系，北大、民大、藏研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只有多加强联系，我们才能在藏学研究上培养出象于先生这样的国际级的学者。于道泉先生最让我们景仰的是他在学术上淡泊自守、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不追逐热点。他只研究他感兴趣的、在学术上有意义的方面，并且在研究上有超前性思维。我们这一代人在目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容易追逐热点，不热的东西就不做，而且要急功近利地做些快见成果、早见成果、能够进行新闻宣传的课题。任先生刚才讲得很好，要做真正的学问，要做真正的学术，就要静下心来，如此，国家的教育、国家的学术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缅怀于道泉先生所应汲取养分的地方。

